

斯特朗文集

I CHANGE WORLDS

— *The Remaking of
an American*

1

斯特朗文集

换了人间

朱荣根 李家声 俞再林 王志文 译

贾宗谊 校

1

新华出版社

I Change Worlds
The Remaking Of An American
By
Anna Louise Strong
Garden City Publishing Co., INC.
New York 1937

根据纽约加登城出版公司 1937 年版译出

斯特朗文集(一)

换了人间

朱荣根 李家声 俞再林 王志文 译

贾宗谊 校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 15 印张 插页 6 张 320,000 字

1988 年 3 月第一版 1988 年 3 月湖北第一次印刷

印数: 1—760 册

ISBN7 5011-0104 3/G·26

统一书号, 7203·201 定价, 6.50 元



作者像

出版前言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一八八五——一九七〇)是美国著名的进步记者和作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诚挚的朋友。她一生追求进步，坚持真理，以犀利的笔为武器，始终不渝地支持世界各国人民的民族独立和解放事业，尤其热情讴歌了苏联人民和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建设成就。

斯特朗一八八五年生于美国中西部一个有教养的家庭，在父母的影响下，她自幼刻苦学习，年仅二十二岁，就以优异的成绩，赢得了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的学位。为了追求公正和自由，她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祖国的进步事业。斯特朗积极参加过反对美国加入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运动，参加过争取妇女权利的斗争，参加过工人总罢工运动，创办过美国西部第一份支持十月革命的报纸。

年轻的斯特朗还是一位出色的诗人。她二十多岁就出版了三部诗集和一部诗剧。为了鼓动劳苦大众参加社会变革，在她编《西雅图工会记实报》时，就创造性地开辟了一个叫《安妮丝》的打油诗专栏，每天发表一首她写的诗。以诗论政，以诗讽刺社会，激励青

DKS4/16
年，一直持续了两年，共写了六百首诗。这些诗被传抄到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斯特朗因为鼓动工人罢工而被捕了。她的一个同事是一个改良主义者，责备她说：“你的所有的老朋友都抛弃了你。有什么人站在你一边吗？”她回答说：“有！有拥有七千会员的锅炉制造工人工会，有锻工，码头工人，机械师，电机工人，和许多别的人。我们只要团结起来就能赢得胜利。”从此以后，对她来说：不是自由主义的良心，而是群众的行动才是有希望的改变世界的动力。

斯特朗出狱后，更以旺盛的精力投入了劳工工作。她在二十年代发表的一首诗《辞旧迎新》，就宣告了她对人类新时代的春天必将到来的信念：

旧时代行将过去，
新时代定要来临。
枯萎腐烂的落叶，
终将埋入孕育新生命的沃土中。

.....

现在是奔向春天的时候了！
虽然还要经受无数严冬的风暴。
人民的力量象熊熊的火焰，
在每个民族的上空闪耀。
笼罩人间的乌云在渐渐消逝，
灿烂的光辉将慢慢把大地普照。

一九二一年，为了寻求革命真理，斯特朗来到了列宁的俄国。她热情讴歌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她长期与苏联人民同过艰苦生活。在那里安家落户，结婚。她不仅写了大量作品赞美“人的新世界与新世界的人”，而且亲自组织美国专家去苏联工作，亲自募捐和运

送物品给伏尔加河灾区儿童。特别是为数万名在苏联帮助建设的美国工程师及技术人员，创办和主编了《莫斯科新闻》英文报。工作很出色。据说，她受到过列宁、斯大林的称赞。斯大林曾亲自主持政治局会议，请斯特朗列席，讨论她改进报纸工作的批评和建议。后来，她被错误地诬为“间谍”，被驱逐出苏联，蒙受不白之冤达六年之久，但她始终冷静思考，坚信真理，顾全大局，坚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通向人类彻底解放的必由之路。

斯特朗对中国怀有深厚的感情。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她曾六次来中国访问。一九二五年她首次来华，大部分时间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中心地广州。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她见到宋庆龄和其他许多进步人士、群众领袖。一九二七年，她访问了墨西哥之后，再次来到中国。在武汉和其他一些地方，她不仅报道了日益高涨的工农运动和反对以帝国主义为后台的军阀的国内战争，也报道了由于蒋介石和汪精卫的背叛而导致的多少人流血牺牲的革命失败。她写道：中国的未来“存在于被捣毁了的农会之中，存在于那些千千万万农民的希望和经验之中。”

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八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斯特朗第三次来华。她专程到晋西北访问了朱德将军的司令部，继而访问了华北各战场。她英姿焕发，穿梭于斗争激烈的敌后各条战线之间。当时正在中国访问的波兰女作家伊罗娜·拉尔夫·苏埃斯对斯特朗作过这样的描述：

“她既有当年乘“五月花号”船去美洲的先驱者的坚定性，又具有一位革命历史学家的清晰头脑。在她严峻、坚毅的脸上—双冷酷的淡蓝色眼睛，使我感到敬畏。……当她谈论她感兴趣的问题——苏维埃俄国、中国、工人运动时，我们为她的激情所吸引，倾听着她如何以严密的逻辑、惊人的清晰和非凡的远见一下子就深入到一

些最复杂的问题的实质。她讲话象机关枪开火一样，客观、不动感情，而且深刻。事实和数字都说明问题。”

一九四〇年底，斯特朗第四次访华。中国的抗日战争正处于僵持不下的阶段。日本侵略者已占领大部分大城市，并诱使蒋介石投降。在国民党内部再次掀起反共、投降的声浪，反动派则加紧策划消灭坚持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的罪恶活动。周恩来同志在重庆向斯特朗介绍了这一形势，说明日益增长着的再一次分裂的危险，远比一九二七年那次还糟，因为民族生存受到了威胁。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发生后，斯特朗即根据周恩来的谈话精神及时准确地揭露了国民党这一阴谋。由于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的立场，以及国际进步舆论和一些国家政府对蒋施加压力，才使这次危机没有进一步扩大。

一九四六年六月，斯特朗对中国进行了第五次访问。在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她看到了希望，增强了信心。当时蒋介石不顾战后签订的协议，正在美国的援助下准备打全面内战。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主席会见了她，发表了举世闻名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斯特朗相信这一理论是正确的，相信中国共产党是不可战胜的。经过她的报道，“纸老虎”的论断在全世界得到了广泛地传播。后来，她在回忆延安的文章中写道：那儿“没有奢侈豪华的东西，也很少舒适安逸的生活……而有的却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思想敏锐，深谋远虑，高瞻远瞩，放眼世界。我感觉到……我自己的胸襟在不断开阔……在这儿，我仿佛终于认识到人类在艰难困苦中前进的历史是可信的。”

第六次，也是最后一次，是一九五八年，当她七十二岁的时候，决定晚年定居中国，直至一九七〇年她安然长眠。她和翻身后的

中国人民一起度过了十二个春秋。

斯特朗热爱中国，写中国，无限信赖中国人民。半个世纪以来，斯特朗的名字，与中国革命斗争历史密切相联。她对中国人民的支持和友谊，为我国广大群众所熟悉与铭感。她同我国老一辈革命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宋庆龄等结成了深厚的友谊。邓颖超说：“斯特朗生于美国，死于中国，她是中美两国人民的共同骄傲，又是两国人民的友谊象征。”

斯特朗八十五岁逝世。她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追求真理的一生。她曾走遍世界许多地方，经历了时代的风云变幻，也经历了个人的严峻考验。但她始终不渝地追求真理，向往革命，从不向命运低头，对人类的进步和前途充满信心。她放弃舒适生活，不顾个人安危，哪里燃起斗争火焰，她就奔向那里，就在那里战斗。她总是站在时代的前线、险峰。她的一生，几乎三分之一的时光，是在她的故乡美国度过的，三分之一的时光，是在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度过的，三分之一的时光，是在她称之为“理想的归宿地”中国度过的。她还到过西班牙、越南、朝鲜、柬埔寨、墨西哥、波兰等许多国家，在那里，留下了她的战士的足迹。

斯特朗终生以笔为武器，用她那敏锐的洞察力，引人入胜的笔调，反映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传播各国人民的友谊。她一生孜孜不倦，直到晚年走路持杖的情况下，仍具有坚强的意志和旺盛的活力。当她七十四岁高龄的时候，为了了解西藏人民推翻农奴制后的新生活，她还坚持要求去海拔三千六百公尺的拉萨采访。由于她惊人的勤奋和智慧，一生中写了上千篇作品，出版了四十多部著作。她的作品被译成十多种文字，在全世界发行，影响着千百万读者。

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战士、杰出的作家和

新闻记者，为了学习斯特朗一生追求真理，向往进步和不怕困难的革命精神，新华出版社决定出版《斯特朗文集》。这套文集含三卷，主要搜集了斯特朗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其内容是：

第一卷《换了人间》(I Change worlds, the Remaking of an American)。一九三七年首由纽约加登城出版公司出版。这是斯特朗于一九三五年写的一部自传体著作。本书详细描述了她的前半生(一八八五——一九三五)的生活、成长过程和在苏联、中国的经历等。从中可以了解她是如何从资本主义的美国来到社会主义的苏联，如何从一个天真幼稚的姑娘成长为一名支持革命的进步记者，如何从信仰宗教转为信仰共产主义的坚强战士。这对研究斯特朗世界观的形成甚有帮助。

第二卷收有《千千万万中国人》(China's Millions, the Revolutionary Struggle From 1927 to 1935)和《我为什么七十二岁来到中国》(why I came to china at the Age of 72)两部著作。

《千千万万中国人》一书，详细介绍了一九二七——一九三五年的中国革命斗争。其中主要记述了武汉革命政府蜕变成反动的军事独裁政权；记述中国人民在极其困难的白色恐怖下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记述了中国红色政权的崛起。书中还讲述了斯特朗与引退回国的苏联顾问鲍罗廷，乘车横跨中国大西北和蒙古沙漠，最后回到莫斯科的情景。作者以纪实的方法，通过耳闻目睹的第一手材料，介绍了在中国大地上所进行的这场波澜壮阔的斗争。

《我为什么七十二岁来到中国》，是斯特朗于一九四七年离开延安到一九五八年重返中国的经历。主要介绍了她是如何于一九四九年在苏联被捕的，又如何以“间谍”罪名被驱逐出境的。她回

到故乡后打算与美共取得联系,但徒劳未成。后来又迁往洛杉矶,她一方面为她无故被驱逐出境进行申辩,另一方面也一天不忘对新中国进行宣传。一九五五年苏联政府为她进行平反。此时美国政府又百般阻挠斯特朗访华,她又为此与美国当局进行斗争,直至她的夙愿实现。

第三卷收有《人类的五分之一》(One Fifth of Mankind---China Fight to Freedom)和《中国人征服中国》(The Chinese Conquer China)两部著作。

《人类的五分之一》是一九三七年斯特朗来华进行了大量采访活动后撰写的。作者讴歌了中国军民同仇敌忾、不屈不挠地抗击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暴行。并坚信中国抗战必胜。

《中国人征服中国》是斯特朗一九四六年六月至一九四七年三月利用“军调部的方便”,在延安、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以及东北解放区进行采访的纪实。在延安,她访问中共总部,毛泽东主席向她发表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谈话。她根据所见所闻生动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现状。展望未来,她对中国正在进行的这场两种命运的决战充满无限的信心。她看到了革命力量正在发展,她预祝一个延安式的新中国即将在烈火中诞生。作者文笔锋利,这是一本既有重要历史价值而又饶有兴趣的书。

斯特朗和斯诺、史沫特莱一样,都是在世界上享有盛名的记者。她的作品文字优美,论理透彻,清新感人,堪称世界报告文学的巨著。作为记者,她采访深入,高瞻远瞩,具有锐敏的洞察力。她在中国的采访活动,描绘出一幅幅时代的巨大画面,闪烁动人的异彩。她的著作不仅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而且史料丰富,是研究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要的文献。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出版

这套文集,不仅对新闻文化界是需要的,而且对全国人民来说,也是很有意义的。

愿斯特朗的革命精神进一步发扬光大!

新华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八月

献给持有我十五年以前观点的
美国人

献给想要了解美国的
俄国共产党人

目 录

第一章	花园里的姑娘	(1)
第二章	花园里的上帝	(13)
第三章	生活的利器	(25)
第四章	我认识了世界	(40)
第五章	我失去了“我的美国”	(53)
第六章	来自莫斯科的信号	(65)
第七章	西雅图“革命”	(81)
第八章	改弦易辙	(97)
第九章	废墟中的理想国度	(108)
第十章	饥荒线上	(120)
第十一章	伤寒与风暴	(129)
第十二章	制高点	(140)
第十三章	北部边疆	(155)
第十四章	俄国早期的美国移民	(168)
第十五章	工人当家作主	(182)
第十六章	我的首次大失败	(197)

第十七章	我的伏尔加的孩子	(210)
第十八章	我成了苏联在华尔 街的代理人	(226)
第十九章	在革命的广州	(244)
第二十章	混乱中的墨西哥	(259)
第二十一章	红色汉口	(273)
第二十二章	准备新战斗	(289)
第二十三章	布尔什维克的 第一个春天	(306)
第二十四章	我们创办了 《莫斯科新闻》	(324)
第二十五章	五年计划时期的 美国人	(342)
第二十六章	向斯大林呼吁	(361)
第二十七章	纷繁的日常生活	(380)
第二十八章	为面包而斗争	(389)
第二十九章	加利福尼亚解释莫斯科 ——真实问题	(404)
第三十章	圣人之死 ——平等问题	(423)
第三十一章	自由的前奏 ——意志问题	(443)
附：	林肯·斯蒂芬斯致作者	(461)
	作者致读者	(463)

第一章 花园里的姑娘

比我年纪大的美国人问我：“是什么因素促使你去莫斯科？”比我年轻的美国人则问我：“我希望在新的天地里开拓事业，如果我去那里的话，你可以给我找到工作吗？”他们所有的人都问这问那，但是却没有胆量这样说：“那边的那个陌生世界，情况究竟如何？你一定了解那边的情况。你在那里生活了十三年以上嘛。那里确有一些世人所殷切期望的新东西吗？若不然，也许只不过是重演生活中早就有过的失望吧？你在那里发现了什么？它使你发生了什么变化？十五年以前，你和我们是一样的啊。”

他们的问题比较深刻，我试图作出回答。为了他们，也为了我自己，我要把我从生活中学到的优良东西加以剖析。我的叙述不应当从我踏上俄国国土的一九二一年秋季开始，而要追溯得很远，远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前，甚至远在战争以前。我同千百万人、甚至同全世界的人们共同踏上的这次征途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记不起了。这条征途通向莫斯科，通向比莫斯科更远的地

方。如果这条征途有什么终点的话，那么，这个终点不应当是莫斯科。但是，我象其他千百万人一样，当我十五年前在西雅图迈开脚步的时候，我不知道我走向何方。

我象其他人一样，在到达终点以前，并不知道我的征途的方向。别人的情况同我一样。我认为，大多数美国人都跟我一样。心理学家把我们这类人叫作动型人。意思是说，我们考虑问题时，不是诉诸视觉形象或听觉形象，也不是诉诸图表计划，而是见诸行动。也许正是我们的开拓性生活使我们变成这个样子，使我们走向一个新天地，只是不断地向它走去，既不可捉摸，也无法规划。也许是机器对我们的神经系统产生了影响吧，同世界其他国家的人不一样，我们几乎是一坐下来就认识了机器。或许这一点并非是美国人所特有的，而是人类的共同特点，因为在个人身上，象在人类历史上一样，觉醒往往产生于行动上的冲突，然后才形成思想。

不管怎么样，我们是在行动。以后，如果我们生存下来，并有时加以论证的话，我们就可以弄清楚我们行动的动机和目的了。多年以前的事浮现在我的脑海：在我读书的大学，一位受人尊敬的女校长谴责我的鲁莽行动，她说：“如果理性不是指导我们的行动的话，那么，理性又是为了什么呢？”我对她说：我的理性的全部职责是在我的行动完成以后对我的行动作出解释，它不负责任何别的事情！这并不是顶嘴，然而她当时却认为我顶撞了她。

有时，我真羡慕这样的人：他们预先设想了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当他们还是风华少年的时候，他们就确定了自己要作一个什么样的人。不过，当我回首往事的时候，我的生活道路虽然没有遵循一个严格的计划，却也大致上有一个连贯的方向。这个方向并不是我明确意识到的，我从来没有事先的安排。我的道路是每日每